

中国人民大学
博士文库

张利民 著

文化选择的 冲突

——“五四”时期东西文化
论战中的思想家

WENHUA
XUANZE
DE CHONGTU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K203 A3

788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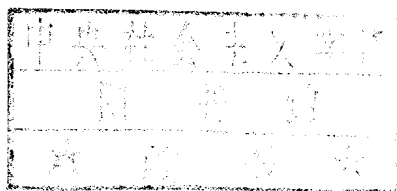
200311395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文库

文化选择的冲突

——“五四”时期东西文化论战
中的思想家

张利民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文库

文化选择的冲突

——“五·四”时期东西文化论战中的思想家

张利民 著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郊海淀路39号)

北京市丰台区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开本：850×1168毫米32开 印张：4.25 插页4

1990年5月第1版 1990年5月第1次印刷

字数：103 000 册数：1—3 000

*

ISBN 7-300-00809-7

I·55 定价：1.70元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文库》

总 序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文库》以反映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学位研究生的研究成果(博士论文)，促进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促进我校科学研究和教学活动，扶植学术新生力量为主要宗旨。

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一项空前未有的宏伟艰巨的事业。为了使这一事业能够沿着正确的轨道顺利前进，必须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和掌握现代科学知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就指出，一个国家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应当清醒地看到，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的实践相对照，当前的理论研究，还显得很不相称。对理论的冷淡和忽视，已经给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带来了严重的危害。没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不懂得现代科学知识，我们不但会在决策上发生这样那样的失误，甚至会使我们在社会主义的大道上迷失方向。因此，在改革开放和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创造性地研究和发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用现代科学知识武装我们的头脑，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博士研究生，是中国人民大学最高层次的学位研究生，他们有广阔的基础知识，熟习自己的专业，有较高的理论造诣和较强的分析能力。他们的许多论文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

2042/40
法，紧密结合实际，对有关课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在同一课题或相关学科、相关专业的研究方面，达到了较高的学术水平。这些论文，不但在理论上具有科学性和开拓性，而且内容新颖、立论严谨，既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又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文库》，由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院、科研处、出版社和书报资料社共同筹集出版基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编辑出版。《中国人民大学博士文库》以每年答辩的博士论文为选题范围，筛选其中的优秀论文，以年度计，陆续编辑出版。

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日新月异的发展，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上的创新，提供了广阔的天地。伟大的时代，正召唤着与其相适应的理论成果。广大中青年理论工作者，特别是获得博士学位的研究生，必将会对活跃和繁荣我国的理论研究，发挥重要的作用。当此《中国人民大学博士文库》和读者见面的时候，我衷心地希望更多的博士研究生，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和刻苦钻研，写出更多、更好的学位论文，有更多的人才脱颖而出，在我国的现代化事业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罗国杰

1988年10月

目 录

绪言.....	(1)
第一章 西化派 (一)：陈独秀.....	(13)
一、东西文明的异同优劣.....	(17)
二、孔子批判.....	(21)
三、捍卫新文化.....	(28)
第二章 唯物史观派 (一)：李大钊.....	(35)
一、俄罗斯文明是“第三新文明”.....	(40)
二、思想变动与物质变动.....	(45)
第三章 东方文化派：梁漱溟.....	(53)
一、文化的三路向.....	(55)
二、东方思想的“价值”.....	(64)
三、走孔家的路.....	(72)
第四章 西化派 (二)：胡适.....	(80)
一、在坚持思想启蒙的背后.....	(86)
二、“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	(91)
三、“全盘西化”——“充分世界化”.....	(98)

第五章 唯物史观派（二）：瞿秋白.....	（105）
一、“东方文化”是什么？.....	（109）
二、现代文明的问题与艺术文明.....	（114）
结论.....	（119）
附录：“五·四”时期东西文化论战大事记.....	（123）

绪 言

古今、中西之争是近代中国思想界的中心议题之一，不同时期、不同阶级的思想家在这个问题上倾注了他们的智慧和思考，这已是人们熟知的事实。本书研究的主题是“五·四”时期的东西文化论战，这是陈独秀、李大钊、胡适、梁漱溟、瞿秋白等思想家的时代。可以发现，近几年随着“文化热”的兴起，上述思想家的文化思想日益引起人们的兴趣，他们的名字不时出现在各种讨论文化的文章中，可以说，他们的思想仍不同程度地影响着今天的文化讨论，研究他们所提出的问题和对问题的回答，吸取他们的智慧和教训，就成为具有现实意义的课题。

“为着理解每一个特定的批判时代的‘智慧状态’，为着解释，为什么在这一时代中正是这些学说，而不是另一些学说胜利着，那就应该预先了解前一时代的‘智慧状态’；应该知道，哪些学说和学派曾在当时统治过。”^①在本书的绪言部分，简单回顾一下“五·四”以前东西文化论战的发展、有影响的人物和理论是必要的，同时，也有必要具体说明本书要研究的主题以及与此相关的问题。

① 普列汉诺夫：《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三联书店，1961年，第165页。

中西之争是伴随“西学东渐”而发生的，从十六世纪中叶起，随着西方殖民势力东来，西学也开始“东渐”，西方传教士一批又一批地来到中国，他们在宣传宗教神学的同时，也翻译介绍了西方一些有关天文、地理、物理、数学以及哲学方面的书。在外来文化面前，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表现出一种开放的胸襟，认为西方文化传入是大好事，徐光启指出，“于国有利，何论远近”；对于西方先进的科学，“欲求超胜，必先会通”。梅文鼎、李之藻、方以智等人表示了相同的态度。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他们积极与传教士交往，讨论科学问题，他们在科学上的成就，是与吸取当时传教士传入中国的科学知识分不开的。另一方面，在更多的士大夫中间却盛行着一股排斥西学东渐的思潮，他们以儒家文化的价值规范看待传入的西方文化，视为“外夷小技”，康熙时代，正统派人士杨光先在反对西洋历法时所说的话，实在代表着这群士大夫的偏狭心理，“宁可使中国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国有西洋人，无好历法，不过如汉家不知合朔之法，日食多在晦日，而犹享四百年之国祚。有西洋人，吾惧其挥金以收拾我天下之人心，如抢火于积薪，而祸至之无日也。”^①可见，中西文化一开始接触就引起了冲突和争论。清代实行禁教政策，禁止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活动，乾隆皇帝则不仅实行禁教政策，而且实行闭关政策，从而中断了西方文化向中国的输入。

在鸦片战争的炮声中，西学东渐运动又开始了，中西文化问题作为一个紧迫的社会问题重新摆在中华民族面前。这以后发生的事情似乎可以借用下面一段话来描述，“新的环境发生了，人们最初遭遇到的是旧方法不能获得有效的结果，生活上发生了困

① [清]夏燮：《中西纪事》卷二《滑夏之渐》。

难。人们不会在没有发觉旧方法不适用之前就把它放弃的。旧的生活方法有习惯的惰性。但是如果它已不能答复人们的需要，它终必会失去人们对它的信仰，守住一个没有效力的工具是没有意义的，会引起生活上的不方便，甚至蒙受损失。另一方面，新的方法却又不是现存的，必须有人发明，或是有人向别种文化去学习，输入，还得经过试验，才能被人接受，完成社会变迁的过程。”^①历史的真实进程要曲折、艰难得多。

文化选择是以一定的比较为前提的，在中国近代史上，人们同封建旧文化决裂的程度是与他们对国外资本主义文化的接触、了解程度成正比的。鸦片战争前，清朝皇帝以“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的神态睥睨世界，蔑视西洋各国为“化外蠢愚”、“蛮夷之邦”。封疆大吏毫无世界知识，同英国做了两百年生意，还不知道它在地球何方，连士大夫官僚阶层中的有识之士林则徐，也深信“英兵腿足伸展不便”。西方文明成了海外奇谈，在徐光启等人那里已经开始熟悉的世界，在此时的中国人心目中反而如此的陌生！

鸦片战争的失败，虽然还不能使整个中华民族惊醒，却促使先进之士开始比较清醒地认识西方文化，林则徐、魏源是突出的代表。经过与侵略军的几次战斗，林则徐看到，英国“以其船坚炮利而称其强”，“乘风破浪，是其长技”^②魏源从战败的奇耻大辱中也认识到：“夷之长技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③魏源甚至认为，美国政府“事无大小，必须各官会议，然后准行。即不咸允，亦须十人中有六人合意，然后可行”，以及美国总统（译“大酋总”）废除世袭，四年一任，由民公举的

① 费孝通：《乡土中国》，三联书店，1985年，第79页。

②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8卷，第217、219页。

③ 魏源：《海国图志》

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是既“公”又“周”的制度，他赞叹瑞士“不设君位，惟立官长……办理国务”，绝无中国“硕鼠之贪残”的弊病，真“西土之桃花源”^①。基于这种认识，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在他看来，中国只有“尽得西洋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才能制服外来的侵略者，恢复中华民族应有的尊严，“因其所长而用之，即因其所长而制之，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②现在看来，林则徐、魏源对西方文化的认识还只是触及表层，但是，在当时朝野上下耻言西学，对西方文明懵懵无知的状况下，他们瞩目西学，提出“师夷”的主张，从而在向西方学习的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

六十年代初，冯桂芬直接继承并发展了魏源的思想，在承认西方科技先进的基础上，提出了若干“变法”“自强”的主张，其重点仍在于“采西学”、“制洋器”和“善驭夷”。冯桂芬的有些观点好象已触及“政”的不同，例如，他认为中国在内政方面有“四不如夷”：“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③。但是，“四不如夷”并没有归结为政治制度不如西方，而是被看作因为封建纪纲不振而暂时出现的现象。

魏源、冯桂芬的思想影响着后来的人们。洋务派接过他们的结论，并开始了一场旨在学习西方军事器械的洋务运动。时间的流逝对这些朝庭重臣仿佛全然不发生什么作用，他们对东西文化的认识，只是停留在这样的水平上，“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李鸿章语）^④，“中国学术精微，

① 魏源：《海国图志》

② 同上。

③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制洋器议》

④ 《同治夷务》卷二十五，第9页。

纲常名教以及经世大法，无不毕具，但取西人制造之长补我不逮足矣。”（张之洞语）^①早期改良派最早多依附于洋务运动，是“船坚炮利”方案的拥护者，但是，他们继承了魏源、冯桂芬等人的社会批判思想，并把他们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某些制度的好感变成比较明确的认识，揭示了中国政治制度的落后。七十年代，王韬指出，西国之强不光是器艺技巧，更主要的是在于，“泰西各国，……无论政事大小悉经议院妥酌然后举行……；中国则不然，民之所欲上未必知之而与之也，民之所恶上未必察之而勿施之也。”^②他认为中国欲谋富强，“达民情”是首要的，他把君主制与民主制、君主立宪制进行比较，提出了中国应效法英国实行君主立宪的主张。郑观应作为八、九十年代改良派的主要代表，从自己从事发展民族工商业的艰难历程中，得出“政治不改良，实业万难兴盛”^③的结论，他明确主张“欲行公法，莫要于张国势，欲张国势，莫要于得民心；欲得民心，莫要于通下情；欲通下情，莫要于设议院。”^④王韬、郑观应的同时代人陈炽、薛福成、何启等通过不同的思想历程，都得出了类似的认识。甲午战争的惨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早期改良主义者对西方民主政治的呼唤在康有为等人那里变成了现实的追求，不再是船坚炮利，政治制度的改变成了关键，这一点在康有为在一八九八年上光绪皇帝《请定立宪开国会折》中得到最集中的表述：“臣窃闻东西各国之强，皆以立宪法开国会之故。……故人君与千百万之国民，合为一体，国安得不强？吾国行专制政体，国安得不弱？……立行宪法，大开国会，以庶政与国民共之，行三权鼎立之制，则中国之治强可计日待也。”

① 张之洞：《劝学篇·自序》

②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达民情》

③ 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自序》

④ 郑观应：《盛世危言·议院》

当康有为、梁启超投身于政治制度的改革时，严复更进一步把东西文化的比较推向思想观念。早在一八九五年，严复就指出，西方的“汽机兵械”和“天算格致”固然先进，但并不是它的命脉所在。那么，西方近代文化的“命脉”何在？严复认为，“扼要而谈，不外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学术的黜伪崇真，就是讲究科学，刑政的屈私为公，就是坚持民主，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严复指出了中西文化的种种差别：“中西事理，其最不同而断乎不可合者，莫大于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中之人以一治一乱一盛一衰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进无疆，既盛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为学术致化之极则。”“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众讥评。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虞。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务发舒；中国尚节文，而西人乐简易。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亲知。其于祸灾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人力。”^①严复的比较涉及了历史观、政治观、伦理观、学术观、自然观等方面，他看到了中国思想观念的落后，从而竭力呼吁“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②

二

文化比较为文化选择提供了客观的依据，同时，历史观也决定着人们的文化选择，正因为如此，伴随着东西文化比较的进行，围绕历史观问题也展开了争论，昭示了历史观的分歧。首先

① 严复：《论世变之亟》

② 严复：《原强》

是变与不变的争论。顽固派“恶西学如仇”，坚持“祖宗之法不可变”“孔孟之道不可变”的形而上学不变论，反对引进一切西方的东西，自魏源开始的先进思想家的共同特征是要求变，但在如何变上又有不同的认识。

从魏源到冯桂芬，在东西文化比较基础上，提出了“师夷”的主张，其历史哲学的依据是“变古”的思想，“变古愈尽，便民愈甚”^①“法苟不善，虽古先吾斥之；法苟善，虽蛮貊吾师之”^②这些洋溢着战斗精神的言论，大有把往古一切传统变革殆尽的意味。东西文化的比较既促使魏源、冯桂芬等人强烈地要求变，同时，比较所达到的水平，以及哲学上的渐变论——“势变道不变”，又制约着“变”的思想，使它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

随着中国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兴起，“体用”、“本末”、“道器”的问题突出出来。“中体西用”曾是改良派和洋务派的共同旗帜，到七、八十年代，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对西方文化的认识已远远超出“船坚炮利”的界限，在哲学上便不时表现出背离“中体西用”纲领的倾向，王韬提出了“器所以载道而行”的命题，指出随着东西方交往的扩大，“民既由分而合，则道亦将由异而同。……道不能即通，即先假器以通之，火轮舟车皆所以载道而行者也。”^③郑观应认识到西学有它的本末，“西人立国，具有本末，虽礼乐教化远逊中华，然其驯至富强，亦具有体用。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火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洋务派的错误就在于“遗其体而求用。”^④

① 魏源：《默觚·治篇》

②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制洋器议》

③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原道》

④ 郑观应：《盛世危言·自序》

王韬、郑观应等人虽然强调“变”的思想，向往西方的代议制，也承认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自有其本末、体用，但是，他们仍然不能舍弃“中体西用”，“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当自躬”^①“道为本，器为末，器可变，道不可变，庶知可变者富强之术，非孔孟之常经。”^②变器不变道，要学习西方但又不能改变以中学为本，时代和阶级局限决定了他们还无法从根本上突破长期以来形而上学渐变论的束缚，但是，这种思想同封建社会中正统的形而上学道器论有所区别，改良派为“中体西用”命题注入了一些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和经济的新内容，反映了早期资产阶级既要求变，但又不肯彻底要求变，既反对封建政治制度，要求改变旧的生产关系，但又不肯同封建主义彻底决裂的矛盾性格。

当改良派小心翼翼地赋予“中体西用”以新的内容，试图挥舞这面旧旗帜，进行政治改良时，洋务派首领毫不含糊地表示了他们的封建立场，“新旧兼学，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③“中体西用”经过张之洞的阐释，成为清朝统治阶级对抗变法维新的理论。

随着维新运动的高涨，资产阶级不仅更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同时，在哲学上他们也逐步克服了改良派先辈的弱点，划清了同洋务派的界限。这样，进步的社会主张不再被陈旧的哲学理论所束缚，而是获得了依据，并为东西文化比较的进一步深入开辟了道路，这主要表现在如下的两个方面：

其一，以道器、体用统一论批判了变器不变道、中体西用的思想，谭嗣同明白地指出“道，用也；器，体也。体立而用行，

① 王韬：《易言·跋》

② 郑观应：《盛世危言·凡例》

③ 张之洞：《劝学篇·设学》

器存而道不亡。……夫苟辨道之不离乎器，则天下之为器亦大矣。器既变，道安得独不变？”①严复则彻底否定了“中体西用”论，“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中西学之为异也，如其种人之面目然，不可强为似也。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②这就是说，体用是每一事物本身固有的，是不能分割的，有什么样的体，就有什么样的用，用依存于体，体变了，用也将相应发生变化。在中学之体上移接西学之用是行不通的，决不能既要保留中国封建制度和意识形态，又要应用西方的科学技术，应该从体到用都学习西方，谭嗣同、严复的观点，可以说是站在进步立场，对“道器”、“体用”争论的总结。

其二，把变易史观推进到进化史观。康有为从自然界是变动进化的论证了人类社会也应当是发展的。发展的规律就是由“据乱世而升平而太平”即“由君主而君民共主而民主，由专制而立宪而共和”，康有为的这一观点，比起魏源、王韬等人朴素“变”的思想来，大大地进步了，但是，他的理论还不是建立在真正科学的基础上，而是把西方的进化论和中国古老的公羊三世说混在一起。直到严复才摆脱了康有为的缺陷，建立了真正的进化史观。

进化史观的确立，不仅为变法维新提供了理论武器，而且回答了东西文化差异的本质，严复依据西方近代的社会进化理论，认识到社会进化，“莫不始于图腾，继以宗法，而成于国家。”欧洲的进化起初比较迟缓，后来变得急骤，在一二百年进入国家阶段，而中国的进化则开始比较急骤，秦朝以后变得迟缓，“由

① 谭嗣同：《报贝元征》

② 严复：《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书》

秦以至于今，又二千余岁矣，君此土者不一家，……播其政法，审其风俗，与其秀桀之民所言议思惟者，则犹然一宗法之民而已矣。”^①这意味着，在时间上同处于当代的欧洲和中国，在社会发展阶段上却是一个处在国家阶段，一个处在宗法阶段，一为今，一为古。严复的思想给后来的西化派以深刻的影响。

三

从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到本世纪初，大多数资产阶级思想家都把建立资产阶级政治制度，视为改造中国的根本，严复比较早地强调了思想启蒙的重要，但是他的思想并没有得到广泛响应，经历戊戌变法的失败，严复更坚定了自己的认识。1905年，孙中山和严复会晤于英国伦敦，当讨论到革命时，孙中山和严复争论起来，严复认为“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于乙，混于丙者将发于丁。为今之计，惟急从教育上着手，庶几逐渐更新也。”孙中山则回答说：“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执行家也。”^②孙中山承认严复讲的有道理，但是紧迫的现实并没有提供充裕的时间在思想文化方面积聚力量。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资产阶级所向往的西方民主共和的政治制度建立了，给人民带来了希望，但是资产阶级没能从政治、经济上摧垮封建势力，不久，共和国的政权也被军阀袁世凯窃取，伴随着政治上的复辟活动，文化上也出现了复古的思潮，各地尊孔组织纷纷成立，身为共和国总统的袁世凯却连续颁发尊孔令……。面对这种社会现实，先进知识分子的希望化为泡影，他们在揭露共和国之下黑暗现实的同时，也进一步思考着共和国

① 严复：《社会通论·序》

② 严璩：《侯官严先生年谱》